

习近平的思想与战略

基于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 (俄)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一个国家发展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制定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实现战略的具体条件和执政者能否有效完成既定目标。那些只有具备明确的发展愿景的国家，才能在不断演化的世界秩序中保持主体地位，而不会受其他竞争对手影响。纵观世界各大国中，目前只有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长远发展规划，并被称为“中国梦”，这就是“两个一百年”，这个蓝图最终将在 2049 年前完成。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共十八大结束两周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 170 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为中华民族未来 37 年、近 40 年的发展制定长期战略目标，这就是高瞻远瞩。并且为实现中国梦设定了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三个必须条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展现

伟大的宗教或学说通常要遭受与伟大的国家相同的命运——经历产生、繁荣和发展后，由于各种因素便开始出现衰落。恢复信仰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用现代内容来阐释那些僵化了的“公理”，正如“旧瓶装新酒”。

我们曾经目睹了欧洲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曾经或正在发生的衰落。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宗教包容

性，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学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但也并不反对新的思想。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上，先后传来了佛教、犹太教、摩尼教、景教及伊斯兰教等。奇妙的是，中国本土学说与外来思想交融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所谓融合的民间宗教形式，即印度的佛像与中国的孔子和关公像共同摆放在寺庙里。

到 19 世纪末，西方的冲击使中国人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把它们发展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讲，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也是如此发展的。

中国的发展和探索经历了一个痛苦复杂的过程。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创了中国农业、工业、科学等领域震惊世界的新局面。这个不凡的经历证明了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

但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出现多种思潮的纠缠交织。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建党一百年时，即在 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即 2049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几个世纪的梦想和渴求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展现。

梦想与实现

提出了中国梦长期规划之后，中国立即着手实现梦想。中共十八大以

来，先后提出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相衔接”。

最主要还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014 年 5 月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这个词。它的含义包括：不再追求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协调产业与地区的平衡，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停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外商投资和追逐海外市场利率。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提高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习近平适时地将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到国内市场，结束在世界生产链中中国廉价劳动力供应商的身份。生产基于本国科研成果的高品质、竞争力强的产品，创建独立金融体系和维护中国全球贸易利益。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对“超成功”中国要发起的贸易战的威胁，只能说明美国对其已经失去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的深切恐惧。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国经历了转向“新常态”所做的经济调整最初的、最困难也是最痛苦的阶段，也成功地保持了震惊世界的 GDP 每年 6.7% -6.9% 的增长率。

“一带一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路线

在 2013 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演讲中，深入阐述了“中国梦”，提出“一带一路”重要倡议。这一倡议最初看上去好像只是为中国出口到欧

洲创建可靠的陆路走廊，很快它就转变为中国在欧亚大陆地区打造整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支撑结构，同时也可以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十个国家具有政治影响力。

四年来，中国政府成立专门机构，以丝绸之路基金（400 亿美元）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00 亿美元）的形式建立了坚实的财务基础。为解决中国一些外部和内部经济问题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成为其他一体化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区，上合组织、东盟、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TR）甚至欧盟的轴心。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针对于外部世界，而且也着眼于中国本身。新丝绸之路贯通了中国。2016 年，本人有幸考察了东起黄海之滨的连云港码头，西至新疆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部分。在旅行中我看到，中国人不仅成功建造了铁路、高速公路、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光纤线路和输电系统，而且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以破纪录的速度新建了城市、科技园、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区。

2017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39 位国家领导人和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签署各种文件的国家数量达到 68 个，高层的沟通加快了战略项目的实施。这是实现中国当前主导的最重要国际工程的第一个重大里程碑。

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名誉客人，其实是论坛的联合主席，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现，俄罗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欧亚大陆地图就足以明了。经过俄罗斯的线路是最安全和最

短的。遗憾的是，在实施这些优势的时候，俄罗斯迄今没有太多可夸赞的成果。高速铁路“莫斯科—喀山”项目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对在亚马尔 LNG 项目和 SIBUR 的投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们不属于新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和中国官员能否找到同时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一些项目，这需要智慧。

全球治理——来自东方的风

五年来，中国在实现中国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也为中国开辟了新的视野。2016 年中国实现了占全球 16.5% 的 GDP 和 40% 的世界增长。基于取得的成就，2016 年夏天习近平在杭州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向世界宣布中国有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2017 年 1 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更为详细地谈到世界治理的紧迫性，中国愿意在创造世界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每一个战略——“新常态”“一带一路”“依法治国”等，都是中国梦更大更长期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由于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中国可以自信地前进。中国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国际关系中，中国这种治理经验为其合作伙伴树立榜样，值得多方学习。

(作者简介：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政论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著有《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

外国学者看中国共产党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全球城市合作

□ 徐学通 高奇琦

全球城市发展不再是零和博弈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地缘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发展全球城市并促进全球城市合作，也要经历一种观念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地缘政治观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场所，每一个参与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惜损害其他参与主体的权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型城市之间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例如，伦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城市国际功能的削弱，而纽约的兴起则导致了伦敦作为全球城市地位的下降。

由此可知，地缘政治观依然是从传统权力竞争的角度来思考城市之间的关系，把城市看成是相互竞争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缘政治观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但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城市治理体系实际上进入了一种相互合作的共生时期，而传统的竞争观念已经逐渐不符合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在更多情况下是合作关系。城市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新的全球化的条件下，合作共赢才是全球政治的常态。

“世界城市日”的设立恰恰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2010 年 10 月 31 日，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发布的《上海宣言》提出倡议，将 10 月 31 日上海世博会闭幕之日定为世界城市日，其目的是让上海世博会的精神得以延续，激励人们为城市创新而不懈追求与奋斗。这项倡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批准，最终正式设立了世界城市日，很显然，这个过程反映了全球治理的特征：全球城市共同应对创新发展问题，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多元合作。

如何加强全球城市合作

中国有句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区域的崛起，往往也会带动相应的城市群的崛起。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优化，同样也需要全球城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未来发展来看，全球城市之间的合作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发力。

产业合作。每个城市在发展中都会形成一定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这些城市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具备了这些产业



的相关属性。一般情况下，任何产业往往都具有上游、中游、下游之间的依层关系和产业生态系统。产业和城市之间的关联，就在于各个城市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所具有的互补性。因此城市之间也需要形成产业合作与互助的生态系统，开展机制性的产业联盟、定期展会、高峰论坛等活动，把产业合作及认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发挥合作背后更大的价值与功能。

贸易合作。贸易是一个正和的游戏，如果一个城市的产品生产过量而滞销，那么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挫伤生产者的利益，而且最终也会影响产业生产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城市之间应当建立共同的贸易体系，通过贸易体系的力量实现相互分工与协作。城市在最初兴起的时候便发挥了贸易的功能，而如今全球城市的发展则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了全球贸易网络的真正形成。因此，在未来，城市之间依然需要就贸易通关、安检以及税务减免等贸易领域加深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合作。全球化的流动首先是人的流动，在全球治理中最难应对的问题也是人的流动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的移民问题，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难题。面对此类问题，在未来的全球城市合作中，社会合作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内容。基于此，城市之间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与协同机制，例如可以在一定协议框架内相互交换或者分享人口流动信息。同时，城市之间还可以就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交流，鼓励社会组织跨国、跨地区合作，为彼此的城市治理贡献更多的和谐元素。

文化合作。现代化的城市化很容易把城市塑造为近乎同质的存在，而文化却能让城市更具个性与魅力。全球化并不是统一化，在全球化流动的刺激之下，许多具有异质性的小众文化往往会

被激发和凸显出来。这种小众文化，同样是经济发展与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也应该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内容。例如，柏林、威尼斯、上海等城市都有体现其城市自身特色的电影节，这些城市可以就电影文化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共同把电影产业和电影文化推进到更加良好的状态。

创新合作。创新是一个城市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而创新的基石是科技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创新是最需要通过合作才能够实现的。全球城市之间应该形成某种创新联盟机制，并就一些重大技术创新共同合作设立一些产业基金来引导和支持相关技术的发展。例如，知识产权的合作在全球城市的创新合作中将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发明人的权利，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好地激励。但是如果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则可能会导致技术产品周期的延长，以及社会总效益的供给不足。而全球城市创新合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已有的技术空间内，在保证发明人利益的前提下，更最大限度地推动技术对人的价值的服务功能。

可持续合作。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人们对消费的追逐刺激了生产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了生产体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程度不断加大，严重考验着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全球城市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是首当其冲的，而面对未来，全球城市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反思这种无节制的发展，从而在发展模式上要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由此，全球城市应该就生态标准、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一系列与生态相关的问题展开深度的研讨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并通过供应链管理的方式，进入到城市的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

举世关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如果将视野放宽，中国对其他大国的外交又何尝不是收获“协调与合作”的果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论述中国同大国的关系时强调“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道出了大国外交未来的努力方向。中国不仅这样说，也在这样做。

举世关注的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如果将视野放宽，中国对其他大国的外交又何尝不是收获“协调与合作”的果实。就拿中印关系来说，一度为国际新闻热点并让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担忧的中印洞朗对峙，在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前夕以印度过境军人无条件撤回而和平解决。可谓是皆大欢喜，各方共赢。中国“不战而退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维护了主权；印度避免了一场胜算概率极小的军事冲突，而且其军人在别人国土上滞留数月而未少一兵一卒，也算胜者；中印同为其重要成员的金砖国家峰会得以照常举行，其他金砖成员也欣喜不已；上海合作组织也不会因中印之争而陷入困境。俄罗斯表示，中印和解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恐怕不完全是外交辞令。试想，如果印走向冲突对抗，跟两国都保持密切关系的俄罗斯该怎样应对？当然，若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俄罗斯可以同时向两面出售武器，借机发战争财。但是，若从更理性的角度考虑，中印交恶，势必极大地削弱金砖集团以及上合组织的影响力，这也就等于削弱了俄罗斯的战略大后方，如此，在面临美国及北约的战略压力时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这些大国外交的案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大国在处理利益争端时，应当从大局着眼，谋求合作，善于协调。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遇到争执或斗争时，解决方式无非两种：暴力方式与和平方式。在当今时代，暴力的方式越来越不可

取。因为它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对解决争执或争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有时表面上看，实力强的一方打败了另一方，争端得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解决，但是，争端的根源依然存在，待暂时失败的一方实力增长，或者是找到机会，还会将争端抬回桌面。而经过一场流血冲突后，争执双方的民族感情被大大伤害，成为以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更为重要的，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因为两国之间的某种利益争端而发生战争，势必会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甚至会诱发世界大战；与此同时，两个大国间的战争也会严重破坏地区发展的环境；对涉事双方来说，走向战争无疑严重贬损其国际形象，伤害其软实力。就拿中印两国来说，也许是双方都认识到战争的诸多坏处，所以洞朗对峙一开始，双方都表示将和平作为解决争执的优先选项。

要和平解决，就必须进行协调，达成稳妥的协议，双方必须都有让步，不可能只是一方让步。只是一方让步，就等于是一场投降。从中印之间的这场争执来看，印度是主动挑起事端方，中方完全有理由不惜任何手段回击印方。然而，中国从自身发展、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发展、世界局势稳定、国际体系变革等多层面的大局着想，释放了极大的诚意和耐心。从印度方面来看，它没有自恃会得到西方大国支持而肆意妄为，使冲突升级；也没有认定中国不愿意打仗而无限期拖延，甚至得寸进尺。可以说，中印双方都为实现“协调和合作”作出了贡献。

近期中国对美印外交的重要启示是，善于“协调与合作”是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境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

协调与合作：大国外交的新格局

□ 刘建飞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应当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局部利益而走向冲突对抗，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而不仅自身遭遇噩运，而且还会拖累整个世界。一个大国的外交，如果不善于通过协调与合作来解决争端，而是动辄诉诸武力，逞一时之强，获一时之快，肯定是不成功，尽管会得到国内民粹主义的赞誉。当今时代，军事胜利往往伴随着战略失败。在强权政治时代，大国外交十分简单，几乎就是变相的发号施令，因为强国实力做后盾。而在当今时代，大国外交需要高超的协调技巧，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大胸怀。中国古人讲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正是这个道理。中国人爱讲“舍得”，这个词充满哲理。要想得，必须有什么？在处理好外事务时，要有什么？为了这个得要舍什么？这是战略谋划时首先要考虑的。